

创业维艰毁誉多

——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二十)

(解放军)

胡居成



蜜蜂洞遇难

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并通告刘少奇、陈毅:“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由于转移路线和转移时间都是受了中共中央严厉批评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都显得很仓促。政工干部连夜为《抗敌报》写社论《临别之言》,为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起草《告皖南同胞书》;参谋人员紧急行动起来,临时突击绘制地图,油印出来发给部队。特别是在战斗编组和行动计划上,更是考虑不周,8000人的战斗部队虽然集中起来,但没有在选定的前进方向上作纵深梯

次配备,以求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而是分别在3条山间隘路中前进,既分散了力量,又不能互相支援策应。这是项英指挥失当的又一明显表现。

当时皖南新四军部队共有9000余人,除军直机关1000人外,其余编成3个纵队。新四军军部直属机关八大处、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随第二纵队前进。

1月4日晚上,全军部队在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的带领下,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悲壮歌声中,冒着凄风苦雨,分左(一纵队)、中(二纵队)、右(三纵队)3路,踏上东进北上的征途。

项英浑身湿淋淋地站在雨中看着部队过江,公务员夏冬青几次把雨衣披在他身上都被他制止,他要同指战员同甘共苦。

从云岭经章家渡到茂林地区,虽然仅有40华里,而且地形道路很熟,但由于连日降雨,道路泥泞,军部那路人马整整走了一夜,至5日天明,才到达预定宿营地潘村。各纵队的前进速度也都比预计的大大减慢,有许多人掉队。直到5日下午3时,才全部到达指定位置。项英看望了一些部队后,感到指战员非常疲劳,如要按原计划开进,势必要增加掉队人员,他和叶挺商量后,决定改变当日继续前进的计划,就地休息一天,推迟到6日晚再出发。

为了关心部队的疾苦,让指战员解除疲劳,恢复体力,项英忘记了古训“兵贵神速”,也忘记了他要迅速冲出包围圈接近天目山的打算。虽是一天之差,却给我军带来了极大的不利,给顽军提供了紧缩包围圈的可乘之机。

接受蒋介石密令要就近解决新四军的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得知元旦这天新四军电台呼叫不出,电话也打不通,即派部队查线,一直查到云岭附近,才发现新四军已于4日晚开走,去向不明。上官云相急得

如热锅上的蚂蚁。5日这天,当上官云相查明新四军分3路向南开动之后,便紧急调兵遣将,在茂林周围的崇山峻岭地带布成了袋形阵地,要在那里全歼皖南新四军。

6日拂晓和上午9时,新四军老三团和军特务团分别与国民党四十师两个团的搜索连遭遇,新四军被迫自卫,双方互有伤亡。下午,项英在潘村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决定仍按原计划行动,即一纵全部出球岭;二纵4个营出丕岭,两个营出缚道岭;三纵一部出高岭,三纵五团作为全军后卫;军直仍随二纵跟进。各纵队于7日拂晓分别通过各岭,正午前后进到星潭、榔桥一线会合,再分路会攻四十师师部三溪镇。

6日傍晚,全军开动。一纵占领球岭后,首尾未能相顾,后续部队遭顽四十师一一八团伏击,孤军无援,损失甚重。先头部队又与顽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在榜山展开激战。

二纵过丕岭时与顽四十师遭遇。7日凌晨4时,担任前卫任务的老三团第三营分两路前进,与守敌激战4小时,全歼顽军一个营,占领丕岭。紧接着,先头部队向星潭前进。

叶挺、项英率军部于7日上午10时到达丕岭,下午2时到达丕岭脚下的百户坑。前沿部队在星潭外围受阻,叶挺、周子昆去前线视察。

星潭是丕岭的出口咽喉,是通向三溪镇、冲出包围圈的必经之地,也是顽军袋形阵地的底部。二纵前卫第三营冲到离星潭3里路的坑口时,据守在坑口两侧高地上的顽四十师一二〇团两个营,以交叉火力封锁通往星潭的道路,三营无法接近,进攻受阻。与此同时,沿丕岭以东百户坑两侧高地,继前卫营跟进的3个营,也都在各自的前进道路上遭到顽军的阻拦,不得不就地抵抗,前进困难。

叶挺、周子昆视察后,立即折回到军部驻地百户坑,由项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行军方向问题。叶挺说:“星潭先头部队受阻,北面敌人向我追来,左右纵队也已打响。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就是灭亡!”

但是,项英不赞成强攻星潭这个方案。他说,我们部队向来不死打硬拚,死打硬拚伤亡会更大,伤员多了带不走也丢不下怎么办?敌人装备好,火力猛,凭河固守,我们过不了河,攻不下星潭怎么办?他犹豫不决,让大家再讨论讨论。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一个打不打星潭的问题,仍然下不了决心,得不出结论。

三年游击战争中那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亏本的买卖不干”的战术原则在项英

脑海里活跃起来,他决定不打星潭,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从三纵的出击方向高岭突围,准备出太平,到黄山,然后伺机从铜、繁渡江到无为。项英的这一决定,使前进中已经取得初步胜利的新四军,造成了混乱。

8日凌晨3时,军部机关和第二纵队经过艰难跋涉,返回丕岭以北里潭仓宿营,准备向高岭进发。当得知五团与顽七十九师在高岭正展开激战,项英决定在里潭仓休息一夜后,改向茂林方向突围。

8日晚上八九点钟,军部得到一个情报,说上官云相命令顽军对我紧缩包围圈,调一四四师去茂林,堵截我军后路,实行前后夹击,欲在茂林地区消灭我军。项英立即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敌,经高坦向茂林方向突围。

面对项英一变再变和情况迅速恶化的局面,叶挺心急如焚。他说现在不是打游击的时候,说走就走。这样大的部队拉过来拉过去,越走越疲劳,越拖对敌人越有利,走茂林方向,很可能还是突不出去。但他的意见没起作用。他只得将教导队从后卫变前卫。军部一面行动,一面派人组织后续的战斗部队新三团赶快上前线。当新三团从后面赶上来时,叶挺指挥机关部队站在路边,让战斗部队通过。

当新三团赶到高坦村以北地区时,由茂林地区南下的顽一四四师先头部队,也到了这里。两军狭路相逢,立刻接火厮杀。经过血战,我军夺取了高坦前沿阵地。但顽一四四师立即组织力量反攻,战斗空前激烈。

站在高坦外淋着雨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领导人,听了报告后,都很焦急。项英的脸色都变了。经高岭出太平,是他凭老经验,想着既能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中钻出去,又可避免过大伤亡损失的方案,结果是一厢情愿。现在退回茂林突围,看来也是不可能的了。项英仰天一声长叹……

此时,项英已束手无策,丧失了信心。他想到1935年3月,他和陈毅在赣南仁凤山区,在国民党几个师的包围之中,最后靠分散突围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胜利。又想到8天前,他给党中央电报中就曾说过:“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于是,他把随身所带文件交给夏冬青,让他立即烧掉,又用他的亲身体会硬说服袁国平、周子昆等人跟他一起分散突围打游击。9日凌晨,他们放弃指挥,不辞而别,向茂林方向突围。

高级干部们对项英等人不辞而别都非常气愤!饶漱石以军分会委员的身份,请叶挺全面负责,指挥一切,并提议把项英等离队出走的情形,向党中央报告。叶挺表示同意。电报以叶、饶两人名义发出:

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正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子昆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10日中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突围受阻后回到军部,这时军部已从高坦转移到石井坑。

项英神色沮丧地对饶漱石说:“你打了电报给中央,那我也打一个去,要求处分。”项英当即起草电文。

1月12日清晨,中共中央将正式决定电告叶挺:

一、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二、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

1月10日下午,转移途中新上任的参谋处长张元寿向叶挺报告,新四军重新集中了近5000人,有三团、新三团、教导队、军特务团、三纵主力第五团。各部队分别守卫在石井坑周围的东流山、香炉墩、狮形山、钢山、坦头和白山等阵地上,虽然饥饿疲劳过度,但士气尚高,准备和敌人血战到底。尾随跟进的各路顽军也接踵而至,把30平方华里的石井坑包围起来:北面是顽一〇八师,东面是顽五十二师,西面是顽一四四师,西北面是顽新七师,西南面是顽七十九师,东南面是顽四十师,正南面是顽六十二师。

叶挺听完报告,沉重地说: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将完全包围了,而且兵力是我们的五六倍。叶挺指示,政治部协同后勤部与地方联系,做好群众工作,购买牛、猪和粮食,让战士们普遍吃上一顿饱饭,准备和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叶挺高声说:“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从我起,直到每一个战士,就是最后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和蒋介石、顾祝同这些卖国贼打到底!”

石井坑只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而且都很穷,哪有那么多粮食和副食品卖给新四军。叶挺不得不带头宰了自己心爱的战马,分给战士们吃。

11日上午,敌人发动第一次总攻,激战到天黑。12日天亮不久,大战又告开始,各个阵地都是短兵相接,反复冲杀,直打得天昏地暗,铁血横飞。晚上,当蒋介石得知新四军还未被全歼时,气得直骂娘,限令13日解决皖南新四军。

13日早晨,顽军即开始第三次总攻。由于蒋介石限令是日解决新四军,所以进攻来得特别凶猛。

下午4时,中共中央12日发出的两个电

报,经华中局转送到石井坑。电报中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重庆交涉恐靠不住”,“你们不要指望,一切靠你们自己”,“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叶挺仔细看完电文,心中明白国民党顽固派冥顽不灵,靠党中央与重庆当局谈判解围已不能指望。在敌我力量悬殊、我军粮尽弹绝的情况下,再硬拚下去没有任何意义。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叶挺痛下决心,决定立即分散突围,下午5时,敌人发动了攻占石井坑的最后一次突击。在长达半小时的炮击之后,敌人从四面八方石井坑潮水般涌来,叶挺在狮形山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他已经考虑好了的分批突围方案。

深夜,敌军攻占了新四军各高山阵地,新四军退到山下。敌军以为新四军再也无力反击,便停止射击。在石井坑恢复了平静之后,叶挺命令十几个司号员,骤然吹响了冲锋号,突围大血战正式开始了。已经秘密运动到突围出发地的新四军各个突围分队,一起向敌人开火,向四面八方杀开缺口,猛打猛冲,勇往直前。

在短则几天、十几天,长则几十天、几个月的艰苦转战中,皖南新四军少则几个人、几十人,多则百余人、数百人的无数支突围分队,历尽艰险,先后回到了苏北八路军、新四军华中联合指挥部,总共1000余人,加上第一纵队从苏南到苏北的一部分人,超过2000人,伤亡、被俘近7000人。

14日中午时分,叶挺、饶漱石、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突围到狮形山西坑,受到顽一〇八师的拦阻,形成对峙。叶挺对饶漱石、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钱俊瑞、黄诚等人说:“还有这么多干部没走出去,我要负责到底。你们先走一步吧,你们行动方便,应尽快突围出去。”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走后,饶漱石考虑,这么多干部困在这里,即使不被敌人消灭,也会冻饿而死。他建议叶挺下山与老熟人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谈判。叶挺说:“我现在是败军之将,已经失去谈判条件。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10年,这个惨痛教训我是要深刻记取的。”饶漱石说:“党中央12日电报中说过,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你今天出去联络,是依据党中央的指示进行的,是党派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在座的同志中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证明是党派你去的。”叶挺听了没有开口,过了很久才说:“如果是党派我去的,我就服从。”叶挺

下山遭诱捕。至此，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战斗结束了。

1月17日，国民党蒋介石宣布新四军违犯军纪军令，勒令解散，叶挺将受军法审判。18日，周恩来以千钧笔力，写下了含悲泣血的16个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就在叶挺下山被扣的当天夜里，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和几十个机关干部、警卫人员，跟着新三团一支突围部队冲到纸棚山口，被敌人的火力压在一条山沟里，情况十分危急。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身上带着金条、银元、纸币等部队经费，爬到项英身边焦急万分地说：“副军长，敌人的火力这样猛，万一我被打死或负伤，身上的经费怎么办？”项英一改过去遇事犹豫不定的习惯，立即回答说：“分，给每个干部带一点，轻装突围。”最后余下的部分金条、银元，由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余立金等6人分开带。

分完经费，部队开始强行突围。周子昆由警卫员黄诚架着向前冲；项英开始由警卫夏冬青、郑德胜架着跑，跑了一段，夏冬青跑不动了，就在这时，一个高大汉子冲过来，一手端驳壳枪，一手将项英拉到背上，边向敌人射击，边向外冲。这个人就是某部副营长刘厚总。

到了巧锋镇，袁国平因负重伤而不忍连累大家，趁大家不注意，掏出手枪自杀了，终年45岁。

项英和周子昆、李一氓等人也都走散了。在两个警卫员和刘厚总的掩护下，项英冲出纸棚山口，来到石井坑西北的合山。他们一边向前冲一边观察，发现四面都有敌人，只有西面敌人的火力好象弱些，他们决定向西面前进。这时，大家都已汗流不止，气喘吁吁。他们翻过山凹，又跑了几里路之后，来到了青弋江边。

过了江，他们看到半山腰上有老乡的苞萝棚子，就想去看看有没有吃的东西，那怕找根苞萝杆子嚼嚼也好，他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可是，他们刚走近棚子，就被山下的敌人发现了。敌人边打枪边向棚子追来。项英跟着刘厚总，又往山顶爬，翻过山后，看到山洼里有块老大的芭茅窝，方圆有一二里那么大一圈，他们就躲了进去。到了天黑的时候，项英估计敌人确实走了，才从芭茅窝里慢慢走出来，沿着一条大山沟，向山里走，想找一个隐蔽的山林，休息几天再突围。

1月15日下半夜，他们来到一座大山腰上，忽然听到下面有人说话，项英就叫排长李德和下去看看，是不是自己人。李德和慢慢摸下去，声音越来越近，他终于听清楚了，是周子昆副参谋长和他的警卫员黄诚的声音。李德和

跑过去一看，果然是他们。

项英和周子昆会合了，见面时，双方都悲喜交加，流下了眼泪。项英难过地说：“部队遭受这么大损失，责任在我，我要向中央作检查，请求处分。”周子昆说：“我也有责任。”

几天后，他们又向南转移到了丕岭。在丕岭和濂岭地区，项英、周子昆先后遇见了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三纵队参谋长谢忠良等人，会合了70多人。

经过惨败和失散后，如今队伍又有了扩大，项英的情绪好了一些。他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指定李志高为临时党支部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刘厚总为副官，并派人去找在皖南坚持斗争的皖南特委书记胡明，和地方党取得联系。项英兴致勃勃地说：“现在有了这么多人，这里的群众又这么好，我们又有枪，这样，很快就能发展一个营到两个营。还有那么多老战士可以当干部，这么好的条件，比起在赣南打游击强多了！”

经过多次侦察，项英决定在丕岭里潭仓东面的田坑里安营扎寨。那里沟长十几里，没有几户人家，又都是外乡人，森林茂密，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都好。项英决定驻在田坑里的沟尾子上，这是大山沟里的一条小山沟，山势延绵峻峭，敌人大部队不易攀登，小部队又起不了作用。项英他们还了解到，这条小山沟的悬崖绝壁上，有两个山洞（即蜜蜂洞）。他和李志高去查看一下，两洞相距近百米。小洞在上，大洞在下。小洞可住三四人，很隐蔽。大洞可容纳较多的人，洞内不太平整，是斜坡式的。为了保证项英和周子昆的安全，临时党支部决定，项英和周子昆住上面小洞。但小洞最多只能睡4个人。周子昆只有黄诚一个警卫员，可以跟首长住，项英当时有老警卫员郑德胜、夏冬青、警卫排长李德和及刚任命的副官刘厚总4个人跟着他，让谁陪他住呢？在几天的突围中，刘厚总给项英的印象不错，个子大，力气过人，枪法又准，多次背他爬山涉水，因此，项英决定让刘厚总跟他住上洞，并让李德和把自己的二号新驳壳枪交给刘厚总使用。

就这样，项英、周子昆带着刘厚总、黄诚住在上面的小山洞里，刘奎、谢忠良带着十几个人住在大山洞里，担任站岗放哨、外围警戒。李志高带着20多人，住在西边的铜山、水岭一带。

这支队伍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隐蔽了近两个月。到了1941年3月中旬，奉项英命令化装潜往铜、繁地区侦察突围路线的排长张益平、李德和完成任务回来了。他们向项英、周子昆汇报说：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已经选好了行动路线，安排了渡江船只。

粟裕将军军事谋略艺术纪事(之三)

——“围魏救赵”解军危

(江苏) 陈兴

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迅速在江苏盐城重建军部,下辖7个师。粟裕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后又兼任第一师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高邮至盐城东部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

新四军军部自重建之日起,就继续高举抗日大旗,成了日、伪、顽的心腹之患,眼中之钉。因此,日伪加紧了对新四军的“扫荡”,妄图乘新军部刚组建、正在整编部队之际,围歼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占领苏中、苏北。汪精卫群丑公开宣扬要“完成皖变未竟之功”,日军头目也毫不隐讳地狂妄夸称,要以“闪击战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但敌人感到在苏中、苏北兵力不足,就加快了“以华制华”的步伐,千方百计引诱国民党军投降,以图借伪军之力共同消灭新四军。1941年2月13日,国民党鲁苏皖游击军原副总指挥李长江

首先率6个纵队万余人投敌,2月18日居然在泰州发表通电,就任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积极配合日军“扫荡”新四军。

新四军获悉李长江公开投敌,当即发布讨逆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

粟裕接令后迅速组织新四军讨逆部队发起讨伐李长江的战役。粟裕指挥第一师3个旅分别从南面、东面、北面直扑李逆驻地泰州城。至19日晚,连克姜堰、石家堡、苏陈庄等外围据点,进至泰州城下。

粟裕为不使李长江有喘息之机,命令部队连夜攻打泰州城。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夜战的特长,多处突击。至20日凌晨,攻克泰州城。李长江仅带领200余人西窜。此役,共俘获李逆伪军人枪5000余,伪军两个团在战场反正。

鉴于讨李战役目的已胜利实现,粟裕遂命令部队主动撤出泰州城,按预定计划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斗争。

由于新四军讨李战役迅速获得全胜,日军的“扫荡”计划被打乱,不得不重新抽调兵力。经一番准备之后,日军发动了对盐城、阜宁地区的空前大“扫荡”。日军集中了第十二混成旅团全部,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和第一旅团各一部,以及苏中、苏北伪军,共1.7万余人,由第十二混成旅团少将旅团长南浦襄吉任前敌指挥官,于7月20日,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港四路合击盐城。时值夏季雨多,河水大涨,便于水上交通,日军以100多艘装甲汽艇在水网区往返冲突,十分猖獗。敌机更是低空侦察、扫射,气焰极为嚣张。活动在盐城、阜宁地区的新四军主力只有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的第三师。

新四军军部对日伪这次大“扫荡”虽早有察觉,早有准备,但没有料到敌人“扫荡”兵力如此之多,来势如此之猛,特别是军部机关大,不大适应游击环境,形势对我十分不利。加之,正当新四军与日伪军在阜宁东沟激战之际,龟缩在宝应县北

项英、周子昆等人把罗湘涛分给他们带的银元、纸币交给谢忠良、刘奎等人,要他们购买布匹、粮食,请当地群众做好适合各种身份的便衣,做好足够整个行程食用的干粮,准备转移到江北去。就在这整装待发的时候,一幕历史的悲剧发生了。

刘厚总在一次出山去采购物品时,看到一张生擒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赏法币5万元的通缉令,前不久他又见到项英、周子昆身上带有金条、银元,这个对革命早已发生动摇,更不愿到江北去的叛徒,于4月4日深夜,趁雷雨

大作之际,用项英给他的驳壳枪,对项英、周子昆下了毒手。正在熟睡的黄诚被“嘭”、“嘭”两声枪响惊醒,他下意识去枕下摸枪,一道手电光向他射来,接着又是“嘭”、“嘭”两枪,黄诚右手臂和颈部受了重伤,当即休克过去。刘厚总以为黄诚也死了,就拿走了枪和项英、周子昆身上的经费,冒着雷雨仓皇逃离了。

天亮时,刘奎、李德和到小洞来接受任务,发现项英、周子昆、黄诚都躺在血泊里。黄诚醒过来了,但他嘴巴张不开,不能说话。

李志高、谢忠良、刘奎等人怀着极大的悲

部曹甸、车桥、泾口一隅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竟然出动6个团的兵力，丧心病狂地攻击新四军益林等阵地，陷新四军于腹背受击的危境。7月22日，盐城失守。继而，上岗、伍佑、刘庄、白驹、阜宁、东沟、益林、湖垛先后失陷。第三师主力虽已跳出包围圈，但军部一些机关遭到敌人袭击，受到损失，著名作家邱东平、戏剧家许晴等100多人牺牲。军部在日、伪、顽合击的夹缝中不断转移，形势异常紧张。

粟裕得悉这一情况后，十分不安和焦急，决心全力以赴，协助第三师保卫军部，粉碎敌人的“扫荡”。

怎么行动？立即率第一师主力北上，攻击日军南翼，这样，将能有效地减轻军部和第三师的压力。但是，这样行动，势必形成与日军决战的架式，这正好投日军之所望。日军这次大“扫荡”，就是要寻找我军主力决战，消灭我军主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同敌人进行决战，显然不是明智之举。粟裕想到这儿，感到不能感情用事。

粟裕反复分析敌情，察看地图。思来想去，他眼睛忽地一亮，双手猛一击掌，自言自语道：“对，‘围魏救赵’，应在南线大做文章！”他根据日军“扫荡”苏北兵力和番号判断，日军为集中兵力“扫荡”新四军军部，已将原驻守在泰兴、黄桥、泰县、南通、如皋、泰州等地的大部日军北调，这一带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驻守，兵力空虚，我们在这一带发动攻势，攻其不备，以解我军部之危，也

就是古兵法说的“围魏救赵”，定能奏效。而且还能乘此有利时机，攻克敌人一些据点，歼灭部分敌人。粟裕想到这儿，立即找师部其他领导人商量。

“我们只在苏中发动攻势，如果敌人不理睬我们，怎么办？”一位同志提出疑问。

“不会的！”粟裕胸有成竹地说，“敌人将主要兵力抽到苏北，在苏中等于露着屁股挨打。如果我们对敌人屁股只是轻轻地拍打几下，他当然不会理睬我们；如果我们将敌人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疼痛难忍，敌人就会为护住屁股不得不撤兵南下。”

同志们听粟裕这么一说，纷纷点头。

“我们在苏中大打，等于引火烧身，对未来局势发展应有准备。”另一位同志慎重提出。

“是的，我们是引火烧身！”粟裕郑重严肃地说，“我们在苏中发动攻势，必然将日军‘扫荡’重心引向苏中，增加苏中压力，苏中今后的日子将不好过。但是，为了保卫军部，为了粉碎敌人‘扫荡’，我们苏中压力再大，即使牺牲局部，也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事先应作好反‘扫荡’准备，尽可能减少损失。”接着，粟裕讲了反“扫荡”措施。

经过缜密讨论，师部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粟裕的决定。

粟裕一面报告军部，一面命令各旅、各分区立刻发动猛烈攻势。各部接令后，东征西讨，相继攻克古溪、黄桥、季家市、金沙、余西、林梓、

石庄、马塘、加力、孤山等日伪据点，歼灭了一批又一批敌人，第一旅主力并围困了南浦襄吉旅团部所在地泰州城和泰兴城。

果如粟裕所料，南浦襄吉见新四军在苏中发动凌厉攻势，多处重要据点连连丢失，四处告急，十分恐慌，不得不于8月11日停止对苏北的“扫荡”，转兵南下，回援苏中。第三师乘机反攻，相继收复阜宁、东沟、益林、湖垛、上岗等地。这样，日伪经长期筹划的“扫荡”新四军军部的图谋就破产了。

粟裕得知南浦襄吉已率部南下，立即指示第一旅：在敌人快要靠近时，主动撤围，同敌人打游击。第一旅根据粟裕指示，待到南浦襄吉离泰州城还有半天路程时，才撤了泰州、泰兴之围，隐蔽集结在古溪、营溪地区，使南浦襄吉扑了空。南浦襄吉气急败坏，集中全力向东“扫荡”，企图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第一旅等敌人靠近古溪、营溪，又根据粟裕指示，于夜间突然以急行军同敌人相对而行，转至敌背后，奔袭泰兴、黄桥之间的敌据点姚家岱，并一举攻克，歼敌一部。南浦襄吉闻讯大吃一惊，慌忙调兵由东向西“扫荡”。第一旅又待敌靠近时，急行军向南，经靖江地区，东返根据地腹地南部集结。南浦襄吉3次率部扑空，精疲力尽，只得于8月20日率部撤回泰州城。至此，敌南下对苏中的“扫荡”亦暂告一段落。

（责编 韩侠）

痛，掩埋了项英和周子昆的遗体，做上记号，便紧急转移了驻地。后来几天，他们几次进出于铜山一带，想找刘厚总为首长报仇，但未找到。后来，经与泾县县委书记洪林、皖南特委书记胡明等商量决定，把工兵连连长刘奎、指导员李建春和一部分武器、款项留下来，帮助建立地方武装，把黄诚留下来养伤，其余70余人，按照侦察好的路线，经石井坑、茂林、中村、铁门臼，从繁昌的小洲渡过了长江……

1949年下半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尸骨，由陈毅负责，从皖南移至南京雨花台。项英的墓置于中间，周子昆和袁国平的墓置于项英墓的两旁。（全文完）

编后：历史掩上了沉重的一幕。项英，这位出身于贫苦家庭的革命领导人，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不能不提及的党的高级干部，亲自参加建立了伟大的新四军，而又几乎亲手葬送了这支革命的力量，功过成败，该如何评说？项英的死纯属偶然，但是，即使他幸免于难，当他面对新四军幸存者那无声的目光和几千死难者那不朽的灵魂，又将作何感想？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扼腕长叹，何如冷静思考。历史人物，还是让历史去评说吧！

（责编 启元）